

传统与现代：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质的诠释

——基于上海九星市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纪晓岚 朱逸

摘要：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对于80后的农民工赋予了新的定义——“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着与其父辈不同的观念与意识，这种不同源于整个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我的认识和行为标准都有着新的构建，全面了解和把握他们的主体特征，明确他们与“一代农民工”之间的代际差异，成为了进一步城市化的关键。本文试图从以往文献入手，通过内容分析展现出文献中所构建的“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质框架，再通过实证分析得以验证，分析文献内容与实证研究结果的一致性，旨在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元分析方法，探究“新生代农民工”更为真实的主体特质，从而构建出清晰而全面的主体特征框架。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主体特质 内生属性 行为属性 制度安排

一、背景与问题

中国历经了改革开放30年城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间二元结构的界限被得以淡化，边界的淡化直接拓展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互动空间，加速了城乡间人员的流动。但是目前，主要的流动方式和向度，还是以农村主要劳动向城市间单向度的流动为主。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首批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分流和回溯，出现了新一代的农民工，被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此称谓源于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意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¹，《意见》赋予了这类群体新的定义。“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征中保留了“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些主要特质，但是在城市化的影响下同时也衍生出了许多较“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主体特质，他们的主体特征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纵观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相关文献，主要立足于不同的视角所进行的分析，如社会保障、就业、城市适应性、公民权利等。但是在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质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表述比较多，往往都是凭借主观的认识来对诸多特征变量进行构建与描述。基于以往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笔者试图探寻新的研究方法，打破传统单一的定性分析方式，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主体

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号）

的特质能有一个更为详尽和清晰的表述。

二、相关文献回顾

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文献，主要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在理论分析方面，多从城乡间的制度安排、社会网络支持、融入城市的方法选择等维度进行的研究，理论分析比较的抽象，虽然对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支持意义，但是缺乏实践的证明。在实证分析方面，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比较广，而且大多是探究“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之间的主体性差异，如由《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所 2007）、《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2010）、《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深圳总工会专项课题研究 2010）等，报告从多个方面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相类似的文章也有很多，但是在分析代际差异时，不同文章对于关键性特征变量都有不同的构建，对于特征变量的选取也有很大的差异，很难形成统一性认识，这造成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质的把握上造成了困难。

无论是理论分析方式还是实证分析方式，都突出了“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特征，城市化的发展赋予了主体更多现代意识和观念。这种现代意识和观念与传统之间的差异，就是全面剖析“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质的关键。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笔者首先采用内容分析的分析方法，利用中国知网（CNKI）为文献来源平台，对于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文献进行定量的搜索与统计。选取描述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特质的变量进行相关文献数量的统计，得出关键性变量，对于变量进行操作化设计，设计调查问卷，选取上海闵行区九星市场内的商户工作人员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的发放与收集，最后通过实证调查的结果与之前文献内容中关键性变量的描述进行比对，验证这些关键性变量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勾画出“新生代农民工”更为清晰的主体特质框架。研究的过程实质是一个前提假设与实际验证的过程，不同之处在于前提假设立于文献的内容分析方法之上所产生，有较为详实的假设基础，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研究的针对性。

（二）内容分析的设计

以中国知网（CNKI）为文献搜索的平台，首先以“新生代农民工”、“二代农民工”为主题关键字、时间范围设定为 2000 年—2010 年的文献进行全库的初次索引，搜索结果所得的

文献为需要分析的抽样框总体。其次，再以“新生代农民工”、“二代农民工”为主题关键字、时间范围改为为 2009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2010 年 1 月—2010 年 6 月两个时间段，分别进行索引，旨在通过分析近一、二年来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文献数量占有近 10 年来文献总量的比例，来判断近年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可以通过文献的数量变化看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从初步意识到深入研究是一个逐步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利用中国知网(CNKI)选取了抽样框总体之后，抽取其中的 130 篇文章为样本文献，借助 NVIVO.8.0 定性分析软件，对于样本文献进行分析，主要方法为：首先，借助软件统计对所有样本文件进行高频关键字的排序索引，得出描述“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质的关键性变量，其次，选取 20 个主要变量为索引关键字，对于所有样本文献进行再次索引，统计得出文献来源的数量，以样本文献中出现关键性变量的篇数为标准，从而进行排序，得出前 10 项的关键变量，再对这 10 项关键变量进行综合概括，最终形成 3 项新的组合变量，为下一步实证分析中变量的具体操作化做好准备，这 3 项新的组合变量成为了描述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质的关键性内容。

四、文献内容所构建的“新生农民工”主体特质

(一) 文献内容分析的结果

1、通过对于中国知网(CNKI)的文献搜索，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关键字的文献共计有 574 篇(2000-2010)，以“二代农民工”为主题关键字的文献有 104 篇(2000-2010)，其中 2000 年—2008 年的文献数量有 160 篇，2009 年的文献有 100 篇，2010 年 1—6 月的文献数达到了 314 篇。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献近两年数量比例占到了 2000 年以来总文献数量的 72%，可见近两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得到较大的增强。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对于“新生农民工”身份定义的确认，从 2010 年起，“二代农民工”的称谓也逐步被摒弃，这种摒弃不仅仅是对于这类群体称谓的改变，同时也是对于这类群体再次认识和态度上的改变。这类群体不再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简单延续，简单的用“二代”来描述他们是不全面的，他们与“一代农民工”有着较大的异质性，而且这种异质性是多维度的。

2、选取 130 篇样本文献，运用 NVIVO8.0 对全体文献样本进行高频关键字的统计，选取其中前 20 位关键性变量进行统计分析。

表 1 新生代农民工关键性变量统计 (NVIVO 8.0)

变量名	文献数量统计值(文献篇数)	文献参考点统计(出现次数)
社会流动	100	692
就业	97	783
收入水平	96	464
年龄	86	402
身份认同	85	729
观念	82	272
户籍	81	381
心理	80	365
培训	79	370
社会保障	72	291
生活方式	66	244
期望	61	162
消费水平	58	198
所处行业	56	168
市民化意愿	53	338
学历	35	53
维权意识	30	75
生活环境	29	45
教育水平	26	44
婚姻状况	16	34

以综合排名前 10 位的关键性变量，实质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3 个不同维度上的特征。即主体内生属性（观念、年龄、心理、身份认同）、主体行为属性（社会流动、就业、培训）、外部制度性安排（户籍、社会保障、收入水平）。依据以上 3 个不同的维度为基础，观察不同维度内“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之间的代际差异，有利于进一步清晰“新生代农民”的主体特质。

（二）文字表述上的“新生代农民工”

1、主体内生属性

在有关内生属性的特征中，年龄是客观性变量，直接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特质，主要表现为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年龄在 22—30 岁之间的这部分人群。而观念、心理、自我的身份认同三个为主观性变量，主要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观意识层面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主观意识的形成，不能简单的用华生的“刺激—反应”（S—R）行为心理学理论来概括，而是要结合现有环境来共同分析，在这一形成过程中，环境最为主要的影响因子

给予了主体更多的影响。在国家推进城市化的大环境下，使得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不再以“农村人”自居，而是主动尝试着向城市人身份的转变，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城市中的一员，他们的身份就是“城市人”。同时，他们在观念上较与“一代农民工”更为开放，善于不断的拓展自己的视野，更乐于接受新的城市文化。鉴于以往文献中的观点，提出假设：

假设 1：“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定，不再是“农村人”，而是“城市人”。

假设 2：“新生代农民工”满足于现有的生活状态。

2、主体行为属性

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评判的标准是“成本—收益”间最大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特征更多的表现为，生存理性选择到社会理性选择的变化（文军 2001），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要行为特质。“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社会的流动，更倾向于向城市发展，同时他们对于就业的意义，不再是传统的生存需求，更多的是学习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为了寻求更好的职业发展，他们也期待学习和提升自我的机会，教育培训赋予了“新生代农民工”较“一代农民工”更多的职业选择空间。提出假设：

假设 3：“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流动上，希望向城市流动，而且更愿意留在城市中发展。

假设 4：就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意义，由传统生存需求转变为自我价值的实现。

假设 5：“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教育培训有强烈的需求。

3、外部制度性安排

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进一步市民化的进程，其中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成为了直接的制度阻碍，由于这些制度性阻碍的存在，从而间接的影响着他们的收入、生活、医疗等诸多方面，各种制度性壁垒的消除对于其实现市民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提出假设：

假设 6：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制度性壁垒，影响着他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假设 7：“新生代农民工”期待享有城市相同的社会保障制度

五、现实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征的诠释

基于对 7 项假设的操作化设计，选取了闵行区九星市场内 500 名“新生代农民工”为调

查对象，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表 2 九星市场“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表

指 标	基本属性	人 数	比 例
性 别	男	245 人	49%
	女	255 人	51%
年 龄	25 岁以下	271	54.29%
	25 岁-30 岁	143	25.57%
	31 岁-35 岁	43	8.57%
	36 岁-45 岁	43	8.57%
学 历	本科	71	14.29%
	大专	57	11.43%
	中专、高中	243	48.57%
	初中	129	25.71%

基于前期假设 1 与假设 2 的分析，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意识的特征，以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我身份的界定进行调查，认为自己是城市边缘人的人数为 157 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14%；认为自己是农村人的人数为 271 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68%；认为自己是诚实人的人数仅为 71 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18%。再从对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我身份界定的满意度调查来看，不满意的为 29 人，占被调查人数的 6%；认为一般的为 414 人，占被调查人数的 83%；表现为不满意的为 57 人，占被调查人数的 11%。

对于自我身份界定变量中设定虚拟变量，取值为（0 城市人，1 边缘人，2 农村人），同时对于满意度程度也设定虚拟变量（0 满意，1 一般，2 不满意），利用 SPSS17.0 针对自我身份界定与满意度两变量进行卡方分析，论证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我身份的不同界定与满意度程度的相关性，探究他们是否真正满足于目前自我身份认同。

表3 自我身份认定与现状满意度调查的卡方检验

Chi-Square Tests

	数值	自由度	P 值（双尾）. Sig. (2-tailed)
皮尔逊. 卡方系数	445.294 ^a	4	.000
或然比	345.051	4	.000

基于调查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定，还是认为是“农村人”为主，这与假设 1 有驳，分析其原因在于，由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诸多制度性差异的存在，使得这部分人群很难真正的融入到这个城市之中，成为城市中的一员，他们在城市中成为了城市中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同时也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归属的群体，所以他们还是认为“农村人”是对他们最为理想的归属。

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表 3 的卡方分析得知，皮尔逊卡方系数的 P 值= $0.000 < \alpha = 0.05$ 的显著水平，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定同对于现状的满意程度有着密切重要的联系，原因在于不同的身份界定影响了他们对于所处环境的预期，从图 4、图 5 可以看到，大多数人对于自我身份界定为农村人，原因在于他们立足于农村人的视角，以此来对现状进行评判。这也是为什么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还能安于城市二元生活状态的原因，其根本还是在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固化。

在社会构建论的视角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是由社会所构建的，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受着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促使了他们对于自我身份认同和自我意识的形成。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基于他的“建构化”理论，分析了现代社会中自我认同的新机制。他着重分析个人是如何一方面由现代性结构所塑造同时又塑造着社会的结构本身。吉登斯指出现代社会中个人可以进行一场“生活政治”，通过自我反思与自我重建，促成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在被社会结构化的同时对社会进行建构。

“新生代农民工”在主体内生属性方面，表现为受着客观因素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张力作用，并极力的寻求这种张力间的突破，他们在主观上寻求着市民化的路径，但是在客观上受着多重的阻碍，各种意识的形成，包括身份认同、观念、心理等，都是在客观环境下的主动适应性构建。

（二）主体行为属性的再认识

基于假设 3、4、5 的内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的调查发现，今后准备留在城市发展的为 86 人，占了被调查人数的 17%；准备今后回到农村发展的为 314 人，占了被调查人数的 63%；对于未来的流向没有明确方向的为 100 人，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 20%。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向度调查结果，与前期假设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种现象的发生源于城乡间差距的缩小，以往由于农村与城市间的“剪刀差”，形成了资源由农村向城市集中，“一代农民工”的行为选择就是源于对于资源分享的渴望，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实现，城市开始对农村起着带动性作用，这种带动效应缩小了城乡间的差距，“新生代农民”不再

是单向度的进行流动，农村中也充斥着大量的资源，他们的行为向度由单向改为了双向间的选择。同时，他们在进行横向的社会流动的同时，他们还依然追求着纵向维度上的社会流动，城市集聚着大量的资源和精英，要实现纵向维度上的流动时比较难的，所以离开城市，返回城市将会有更大的机会，机会成本的损失也会比较小。故而针对于前期假设 3：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向城市流动，更愿意留在城市，实际调查中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有较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是愿意和希望向自己的家乡或农村流动。

就假设 4：就业的意义而言，有 45.71%的人选择了自我实现；有 37.14%的人选择了改善生活；有 8.57%的选择了学习技能；同样还有 8.57%的人选择了生存的需要，实际的结果与前期的假设一致。在假设 5：获取培训的需求方面，有 91.43%的人选择了需要，表现出了获取知识的强烈欲望。

综合有关“新生代农民工”主体行为属性的假设与验证，可以得出这部分人群的行为表现出较为明确的目的性，同时在主体行为上表现出了理性的特质，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盲目的出来务工，从而解决生存的寻求，其目的简单而且途径单一，“新生代农民工”则表现为理性基础上的最佳路径选择。

（三）外部制度性安排的再认识

制度安排构成“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的外部环境，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意识。针对于假设 6 与假设 7，就“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现行户籍制度进行调查发现，认为当前的户籍制度成为融入城市阻碍的人数为 100 人，占被调查人数的 20%；有时成为阻碍的为 143 人，占了被调查人数的 29%；而不成为阻碍的为 257 人，占到调查人数的 51%。

通过以上数据可知，以往常常被提及的制度性障碍，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已不再是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条件，而是一项充分条件。在现有的“二元结构”制度安排下，他们依然有着较高的满意度，城乡间不同的制度对于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们之所以能接受不同的制度安排，主要源于几个方面的原因：

1、宏观环境下户籍制度界限的淡化，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能有与城市居民现有相同权益。在社会保障方面，不同的制度安排也给予了他们更多的社会保障方式选择。

2、“新生代农民工”意识观念的转变，“第一代农民工”视成为城市居民为自我实现的目标，由此造成了行为目标单一性。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他们的自我实现目标变得更为多样化，而且他们衡量自己是否成功的标准，已不再是仅仅成为城市居民，变现为更为多元化。

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关注户籍的程度，户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不再那么重

要，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变得更为开放，他们都能主动的来适应不同制度间的差异。

六、思考与启示

（一）营造公平良好环境，确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同城待遇

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还觉得自己是“农村人”的身份，虽然他们生活在城市之中，但是他们还是被城市所排斥，难以真正的融入城市之中。摆脱这样的困境，关键还在于宏观环境的营造，这种环境主要是各种制度的安排。2006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公平对待，一视同仁是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原则，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此外，还包括舆论环境的培养，使得整个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识得以改变。在营造环境的同时，还要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认识入手，逐步增强其城市主体的意识，使其感到自己不是城市中的过路人，而是城市中的主体，从而对于自我有一个新的角色定位。

（二）“逆城市化”可能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所追求的不再是留在城市，或解决生存的问题，而是寻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最佳路径。城市化是现代文明与城市发展的标志，但是这种文明与发展的表现不应是单向度的，“逆城市化”也不应成为发展倒退的标志。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理性，其大量向农村社区的回归，实质上也是他们需求自我发展空间的一种方式，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差距的缩小。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带“技”回归农村社区，更有利于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从而实现城乡整体的协调发展，“逆城市化”是“新生代农民”用脚投票的结果。

（三）城乡“二元结构”消除或淡化

“二元结构”的存在决定着城乡间不同的制度安排，从而造成了就业、教育、生活、社会保障等诸多制度上的差异。城乡的一体化实现，有利于这种差异的消除，但是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来看，他们并不是十分在意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关键在于“二元结构”的完全消除，而是在于“二元结构”的淡化。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制定大一统的制度，不利于突出制度的针对性，制定针对不同主体，而符合其需求的制度，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进一步市民化的关键，也是淡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Wang Xingzhou,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An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 3, August 2008

[2] Liang Ying, A Study of the “Post-1980” Migrant Farming Workers, 《China Population Today》, Vol 25 No4 2008

[3]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 2007

[4] 深圳总工会专项课题研究, 《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2010

[5]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2010

[6] 殷娟, 姚兆余,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第3期

[7] 何绍辉, 在扎根与归根之间: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研究, 《青年研究》, 2008年第11期

[8] 郭维家 蒋晓平 雷洪,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成都市两个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分析, 《探索与争鸣》, 2008年第2期

[9] 陈占江, 李长健, 新生代民工的发展困境及其解决机制, 《求实》, 2006年第1期

[10] 刘传江 程建林,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 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 《人口研究》, 2008年第5期

[11] 韩振方, 论新生代民工的特点与作用, 《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年第4期

[12] 樊荣, 农民工代际转换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0年第2期

[13] 朱宇, 新生代农民工: 特征、问题与对策, 《人口研究》, 2010年第2期

[14] 何绍辉,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研究, 《当代青年研究》, 2009年第9期

[15] 许传新,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学术探索》, 2007年第3期

[16] 史斌,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 《南方人口》, 2010年第1期

[17] 吴漾,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东岳论丛》, 2009年第8期

[18] 蔡志刚,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初探, 《理论探索》, 2010年第2期

[1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号)

作者简介:

纪晓岚 (1955—) 女 辽宁 沈阳人, 汉族, 研究方向: 城市化与小城镇发展研究 研

究领域包括城市学基础理论、农村城市化、小城镇社会保障研究等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系 主任，国家小城镇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朱逸（1982— ）男 上海 汉族 公共管理硕士 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农村社会学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工程硕士项目部 招生主管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